

1727—1745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齐光*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朝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系统梳理1727—1745年间即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与哈萨克之间发生的军事防御、边境冲突、战役战斗等军事战争行为的大体经过及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着重阐明每次事件的时间、地点、指挥官、兵数、主要目的、战役背景及战场地理环境等问题。

[关键词] 噶尔丹策零 准噶尔 哈萨克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23)04-0014-16

正如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准噶尔人所反映的：“哈萨克兵每年都趁机来我西北边境两三次”^①；而准噶尔也向“哈萨克地方，每年都进兵。”^②期间，以噶尔丹策零为首的准噶尔部与其周边的哈萨克之间，有过多次的军事冲突，后来在哈萨克地区也发生过较大的战役战斗，直至1741年(乾隆六年)春，准噶尔军队俘获哈萨克之阿布赖苏勒丹后，双方才签订和平协议，终止了敌对行为。

一方面，1729年(雍正七年)准噶尔部与清朝进入战争状态，至1739年(乾隆四年)，清与准噶尔部签订和平协议，双方进行了长达10年的拉锯战。为获取有益战争情报以调整己方的部署和战略战术，清朝军队频繁地收取了准噶尔方面的情报。^③而在这些用满文记录的情报当中，含有较多有关准噶尔与哈萨克关系的情报。当时的清朝前线指挥官，在秘密审讯准噶尔人战俘和脱逃回来的清朝人

* [作者简介] 齐光(1981—)，男(蒙古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清史、边疆史地、历史军事地理研究。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9~282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出征准噶尔被俘脱回厄鲁特兵达尔扎供词并解京折(附议复片1件)，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0~426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将来投辉特部敦多克等审明解京折(缺文首)，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③ 可参见齐光编译：《清代准噶尔情报满文档案译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

员时,每每都会问及“是否听到俄罗斯、哈萨克、布鲁特地方消息”^①。因为准噶尔与其周边地方的关系,能够影响准噶尔与清朝的战争。其中,拥有较多军士且与准噶尔长期不和睦的哈萨克,是清朝比较关注的一大势力,故而记载的也比较多。

虽然准噶尔战俘或投诚者为了活命而常常贬低准噶尔,尽说准噶尔欠好的一面,但综合分析这些被审讯人员提供的情报,仍可确定当时发生的一些事实。况且这些提供情报的人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清朝己方被俘后千辛万苦脱逃回来的士兵,他们对准噶尔内情的反映和陈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以下,笔者利用清朝当年用满文记录的这些军事情报,梳理和分析1727—1745年(雍正五年至乾隆十年)间,准噶尔与哈萨克发生军事战争行为的大体过程及其主要原因。

一、罗布藏舒努的出逃与哈萨克的关系

准噶尔统治者噶尔丹策零同父异母的弟弟罗布藏舒努,曾是噶尔丹策零最大的、且是唯一的政权竞争者。罗布藏舒努的生母色特尔扎布,是驻牧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锡汗的亲生女儿。以此为背景,罗布藏舒努拥有很高的威望,是准噶尔汗位的有力候补。^②但是在1727年(雍正五年)策旺阿喇布坦去世前后,准噶尔内部曾流行以下传言:

罗布藏舒努去征讨哈萨克时,曾率三千兵前往,去了已有六年。据说罗布藏舒努与哈萨克头人,一起顶礼佛像,起誓成为盟友。策旺阿喇布坦听到此话后言道:顶礼佛像,与哈萨克一同发誓,伊欲何为,等语。旋即差遣察罕哈什哈,前去逮捕罗布藏舒努。巴图尔宰桑、台吉扎勒、讷默库三人听到此事后,前往罗布藏舒努处告称:已派察罕哈什哈来逮捕尔,等语。旋即罗布藏舒努率营中七人,带上撒袋弓箭,出营投奔土尔扈特,走后次年到达伊外公阿玉锡汗处。接着,给伊小母色特尔扎布,伊姊车宗,弟大巴朗、小巴朗四人寄去药物,并嘱咐毒死伊父策旺阿喇布坦,是故策旺阿喇布坦的身体不甚好矣。伊之小妻色特尔扎布、长女车宗、儿子大巴朗、小巴朗等人,酒中掺药,以消化食物为由,欺骗策妄阿喇布坦喝下,当即毒死。此四人还商议称:向噶尔丹策零派人,去告伊父病重,其必前来,俟来时我等袖里藏刀,将其处死,此人死后,由我等掌控准噶尔政务,等语。如此商定后,大巴朗藏刀于袖里。噶尔丹策零听到伊父病重后,立即前往,对此察罕宰桑知情后,急忙劝阻噶尔丹策零道:大巴朗藏刀欲要害尔,尔莫要进去,请速速返回,此母子四人商议,杀害尔等父子,试图霸占准噶尔政务,等语。于是噶尔丹策零立即与察罕宰桑一同返回,第三天带兵逮捕伊小母色特尔扎布及与其私通的男子锡喇穆济二人,裸抱捆绑一处,割下男子之肉令女子吞噬,割下女子之肉让男子吞噬,噶尔丹策零亲自监督,凌迟处死。捉捕大巴朗后,噶尔丹策零言道:尔曾藏刀欲要害我,现用此刀挖你眼睛,等语。噶尔丹策零挖掉大巴朗的双眼,囚禁于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106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报自准噶尔来投回子土勒克玛木特供词折,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② 关于罗布藏舒努的详细历史,参见乌云毕力格:《小人物、大舞台与大角色》:罗布藏舒努和十八世纪欧亚卫拉特汗国与清朝关系,载《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8页。

阿克苏城。^①

暂且不管这种传言的真实度有多高,也不管这是否是已掌控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策零一派的捏造,还是宣传。关键在于,至少这种传言会给准噶尔人一种印象和认识,即罗布藏舒努曾是与敌方哈萨克头人一同发誓成为盟友的叛变者。并以此造成一种普遍的、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立场和舆论,借此防止准噶尔内部再次出现投敌叛变的叛徒,从而更加牢固地确立噶尔丹策零在准噶尔部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这种传言也预示着,在噶尔丹策零统治准噶尔部期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关系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轻易达成和平。后来哈萨克进犯准噶尔时大都伴随着是罗布藏舒努带领哈萨克兵前来的谣言,一是在显示这种准噶尔内部政权斗争的延续性,二也表明外部势力与内部政敌之间的一种关联性。

所以说,1727年(雍正五年),噶尔丹策零上台后的准噶尔与哈萨克间的军事战争行为,既有掳掠人畜财产这种游牧部族自古以来追求利益的一面,同时也有维护噶尔丹策零统治准噶尔合法性的现实需要。诚然在这层意义上,普鲁士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②这句话是非常贴切的。

二、1731年哈萨克军队进犯准噶尔西部

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反映,1731年(雍正九年)9—10月间^③,策凌敦多布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带兵驻扎时,噶尔丹策零行文称:哈萨克、布鲁特,由西喇嘛勒等路,三路来兵,掳走准噶尔游牧地1000余户。此文到达后,令大策凌敦多布尔挑选精壮兵丁、马驼,不分昼夜驰来。为此,大策凌敦多布立即挑选精壮马驼、兵器,带领巴济、达什达尔扎等人前往。^④但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其他满文档案反映,哈萨克军队此次只掳走了准噶尔驻扎在边境的300余户,^⑤有的说是驻牧在西喇嘛勒地方的200余户。^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记载道:哈萨克1000兵,经由伊犁西面的巴哈纳斯地方前来,掳掠了额尔克坦鄂托克之1000户。行走在巴尔喀什湖冰面时,冰层断裂,哈萨克掳走的1000户人俱掉进湖里淹死,哈萨克兵亦受损失。旋由准噶尔额尔克坦鄂托克之德木齐津巴带领追赶的200兵,将剩下的刚从湖里出来的哈萨克兵,阻击于湖边,打死许多哈萨克,只有500余名哈萨克兵逃回去。^⑦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38页,副都统格默尔等奏逃回之三音扣本供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家族内讧情形折,雍正九年三月初三日。

② [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什么是战争》,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3页。

③ 为方便理解,本文的时间,俱已转换成公历。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4~288页,大学士鄂尔泰议奏北路应设卡防范准噶尔并继续探询哈萨克等抢劫噶尔丹策零牧场等事折,雍正十年四月十七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4~418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自准噶尔脱回子苏布尔格口供并送原籍哈密安置折,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⑥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0~438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闻出征准噶尔时被俘喀尔喀部绰伊扎布等人脱回并解往京师折,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⑦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上述史料中的西喇孛勒在于何处,《西域图志》等清朝编纂的文献并没有记载。而从《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可知,它在伊犁西边10天路程的地方。^①在蒙古语中,西喇(Mon:sira)是黄、黄色之意,孛勒(Mon:bel)指山腰地带。据笔者推测,西喇孛勒应在今哈萨克斯坦之阿拉木图州境内的卡布恰盖水库及其北岸的琴格利德一带。《清乾隆内府舆图》也十分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②该地在今哈萨克斯坦之阿拉木图州境内的库羊地山脉西端的南麓,伊犁河从沙漠中流过,稍稍泛黄,故而得此名称。西喇孛勒,南有昆格山脉,北有库羊地山脉,中间流着伊犁河,必是军事要冲,扼守此地,可阻截东西走向的河谷通道。

巴哈纳斯地方,即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的巴卡纳斯河。属于哈萨克左翼或中玉兹,表明此次军事行动由哈萨克左翼或中玉兹领主进行。后来的哈萨克著名领袖阿布赖汗的游牧地,即在此巴卡纳斯河和达甘迭雷河的西边,即通德克河的发源地一带。^③

上述史料中的巴济,原是清朝统治下的辉特部辅国公,游牧地在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境内的阿尔泰山东麓一带。1731年(雍正九年)秋,大小策凌敦多布两位将军率领的近20000名准噶尔官兵活动在阿尔泰山东麓、杭爱山西麓一带时,巴济和达什达尔扎等卫拉特蒙古王公率部归顺了准噶尔。此次巴济率属下兵丁前往准噶尔西部地区防御哈萨克,是噶尔丹策零有意要测试刚刚归顺的这些厄鲁特王公的忠心,同时也要防止其逃回阿尔泰山东边的故土,为此后来也将他们安置在了西喇孛勒地方,以图攻防哈萨克。^④

额尔克坦鄂托克,是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直辖的一个比较大的鄂托克,游牧地在巴尔喀什湖南边的托博陇地方,^⑤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之阿拉木图州境内的卡普恰盖水库、伊犁河北岸的奥特夫一带。上述的西喇孛勒,应被视为额尔克坦鄂托克部分居民的游牧地为好。准噶尔上层将这支较大鄂托克安置在这一带,其目的很明显,即为了便于侦查和攻防哈萨克。德木奇,是鄂托克内的职官,主要负责监督、催促、检查、审理工作,地位比宰桑低一级。

按平均1户5口人计算,1000户,约有5000人。在当时这是个很大的数字,约等于一个中等鄂托克的人口。加上马、驼、牛、羊和其他财产,无疑是个巨大的群体。在山脉、河流、沼泽、沙漠纵横的伊犁河中下游地带行进极为不便。1000名兵丁的军队即便行动力、战斗力很强,也无法将这么多人口短期内带到哈萨克的鄂托克当中,更何况是在准噶尔军队围追堵截的急行军情况下。所以说,掳掠1000户是不大可能的,想必是200户1000口人。上述满文档案所记载的传言大有夸张的成分,加上被审讯者的夸大心理,相关数字与实际出入很大,这方面应谨慎对待为好。

在准噶尔的鄂托克中,有叫德沁(Mon:döčin)的组织,起初是由40户人组成的小规模游牧集团,沿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38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敦多克固木扎布供词并将其解京折,乾隆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条记载:我等之游牧驻在西喇孛勒,噶尔丹策零那边再走十天路程。

②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八排西四”部分,东北角“伊犁必拉”左边的一条河上,标有“沙尔博尔”字样。两河中间标有粗字“哈布齐海噶图尔噶”。

③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七排西三”部分。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26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车林等供词并解京安置事折,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⑤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1~228页。

着地形生产生活,长官也叫德沁。这种德沁游牧集团,后来成为准噶尔主要的居住形式。想必哈萨克兵此次掳掠了居住在准噶尔西部地区的5个德沁左右的人口。

从以上分析可知,1731年(雍正九年)秋,一支约1000名哈萨克兵丁的军队,从巴卡纳斯河流域出发,到达巴尔喀什湖东边后,迅速向右转进突袭居住在伊犁河中游的准噶尔之额尔克坦鄂托克,掳掠200户1000人后,沿着伊犁河下溯至巴尔喀什湖。因该湖冰层解冻,被掳掠的民众和哈萨克兵掉进湖里死伤惨重,加上准噶尔军队的追击,最后只有500名哈萨克兵逃回本土。可能因是秋冬时节,冰冻不牢,人畜众多,行进急促,压力过大,故而溺水。事后,针对哈萨克,噶尔丹策零将大策凌敦多布从阿尔泰前线调到西喇嘛勒一带的西部地区,以增强其军事防御。

三、1731年哈萨克军队袭扰准噶尔北部

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的准噶尔和哈萨克之间,大体有五处利用比较频繁的通道。从西南向东北,依次是塔拉斯河、楚河、伊犁河、额敏河、额尔齐斯河这五条河流的河谷地带。塔拉斯河、楚河、伊犁河等三条河的谷地位于准噶尔西部,额敏河、额尔齐斯河谷地,位于准噶尔北部。1731年(雍正九年),哈萨克军队在进犯准噶尔西部的同时,还袭扰了准噶尔北部。

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记载,曾有杜尔伯特台吉扎勒派人告称,哈萨克来兵杀害了驻扎在额敏的台吉苏第,已掳走500户人。旋即小策凌敦多布派人前去探取情报,抵达额敏边境看得,空旷无人。于是沿着哈萨克兵回去的踪迹,跟踪100余里,赶上10余人驱赶疲惫马驼行走,捕获其中1人讯问得,哈萨克名叫德尔默萨勒的将领,带领1600兵,杀害驻扎在额敏的台吉苏第,掳掠其500余户后,撤回已3天。^①上述史料又反映,1731年(雍正九年)秋,哈萨克来兵2000人或余人,掳掠杜尔伯特时,杜尔伯特台吉固鲁西第率1000兵迎战,阵亡400余兵,固鲁西第本人也阵亡,哈萨克掳走杜尔伯特2000户。随后,辉特卫征和硕齐子齐木库尔领500兵,于喀喇巴罕巴咋尔地方进行阻击。齐木库尔500兵内,阵亡200,齐木库尔本人亦受伤几处,勉强逃出。^②1731年夏,杜尔伯特达赖太师下的台吉锡第和宰桑博洛二人,带领300兵,曾在北方驻扎卡伦。入秋后,突来哈萨克1000兵,包围卡伦,杀害台吉锡第和宰桑博洛,打死100余兵,并从北面尾随,摧毁游牧进来,掳掠达赖太师所属500户人,又抢走许多马牛羊。^③

这里的台吉苏第、台吉固鲁西第、台吉锡第,都是同一人,指准噶尔所属杜尔伯特台吉固鲁达什。他是杜尔伯特达赖太师第四子鄂木布代青和硕齐第三子车臣台吉的长子。而台吉扎勒,是鄂木布代青和硕齐长子齐什奇布的长子,与台吉固鲁达什同辈,同属鄂木布代青和硕齐家族。从他们前辈所持有的太师、代青和硕齐、车臣等封号来看,这一家族实力雄厚,拥有众多属民和财产,军队战斗力比较强。之所以被准噶尔统治者安置在塔尔巴哈台山南麓,西抵阿亚古兹河东岸,南到阿拉湖、萨瑟克湖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9-426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闻回子莫罗阿布都力木自准噶尔来归并审讯情形片,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156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将投来之厄鲁特特古思济尔噶尔审明解京折,雍正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北岸,东至额敏河谷地为止,即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的申戈扎、塔斯克斯肯、奥尔塔库都克农场一带游牧,以向北重点防御哈萨克。

辉特卫征和硕齐子齐木库尔,是准噶尔所属辉特部卫征和硕齐次子齐木库尔台吉,即著名的阿睦尔萨纳台吉的二哥。这一家族游牧地的一部分,在塔尔巴哈台山南麓,额敏河北岸谷地,即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的乌尔贾尔、马坎奇一带。作为杜尔伯特部鄂木布代青和硕齐家族的辅助力量,协防哈萨克。

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土尔扈特等部,虽然同属于卫拉特蒙古,但在准噶尔,他们并非掌握政权的绰罗斯部的直系宗室,故而常被分别安置在边境线上。尤其在北部,与哈萨克人常打交道的,往往是杜尔伯特和辉特两部之人。他们的游牧,沿着塔尔巴哈山脉而居,南接额敏河,北到阿亚古兹河,东至额尔齐斯河,西达阿拉套山。上述满文档案中所记的“额敏边境”一词,并非指具体的额敏河,而是指这一地带的军事防御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1731年(雍正九年)秋,由名叫德尔默萨勒的将军带领1600余人组成的哈萨克军队,从巴卡纳斯河流域出发,向左经阿亚古兹河谷南下,突袭准噶尔北部由台吉固鲁达什和宰桑博洛带兵驻守的卡伦防线,打死100余人后,继续追击南进,侵入杜尔伯特部鄂木布代青和硕齐家族的游牧地,打败该部少数军队,打死固鲁达什台吉本人及400余兵后,掳走了该部500户近2000名人口。旋即,游牧在其南部的辉特部齐木库尔台吉率领属下,迅速沿着塔尔巴哈台山北上,从东边迂回至哈萨克军队撤退的交通线上,在山区喀喇巴罕巴咋尔地方阻击了带着战俘缓慢北上的哈萨克军队。然因寡不敌众,损失200名士兵后被迫撤回。

但是,关于固鲁达什台吉与哈萨克作战的详细情节,根据后来投奔清廷的一位准噶尔巫师反映,他本人曾跟随台吉锡第(即固鲁达什台吉)生活,每次出征时,锡第都会带他前往。1732年(雍正十年),噶尔丹策零命以台吉锡第为首,率领1000兵,派去征讨哈萨克。那次准噶尔军队进兵至哈萨克之哈苏巴颜乌拉地方,掳掠其牲畜、财物返回时,途中哈萨克伏兵突然来袭,因仓促迎战,锡第阵亡,1000兵只有100余人逃回故地。这位准噶尔巫师还说道,他曾跟随锡第台吉,前后进攻哈萨克共10次。哈萨克毫无领袖,每个鄂托克只有一位头人。准噶尔若大举前往,哈萨克共聚一处抵抗,准噶尔若派少量军队,凡所到之处,鄂托克头人合力抵抗,防守甚严。^①

由此可知,也有可能是准噶尔方面先派兵侵扰了哈萨克,以致哈萨克人集中兵力进行伏击,将固鲁达什台吉及其1000兵打死大部,并进一步追击至杜尔伯特部的游牧地,掳掠了部分人畜而去。固鲁达什台吉所率的军队出发是在1731年(雍正九年)秋冬时节,交战返回时已是1732年(雍正十年)春,这符合准噶尔人的军事征战习惯。但是当时准噶尔军队主力在阿尔泰山东边与清军作战,游牧地军队很少,固鲁达什台吉不会轻易进兵哈萨克,这有些难以置信。如果主动进兵,一是固鲁达什台吉受到当年7—8月间准噶尔主力在和通呼尔哈战役中大败清军的胜利鼓舞而急于建功立业,二是哈萨克兵力过于分散、薄弱,给固鲁达什台吉造成一种轻敌的感觉。

如上所述,1731年(雍正九年)秋,准噶尔的主力部队20000余人,跨过阿尔泰山,在今蒙古国境内的扎布坎河流域,与清朝的驻屯军进行迂回作战。这20000余人,是准噶尔军队的精锐之师,也是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护理定边左副将军印务参赞大臣海兰奏报由准噶尔投诚厄鲁特巴雅尔口供并将其解京折,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

其全部军队的绝大多数。在游牧地剩余的尽是一些老弱病残或妇女儿童。上述固鲁达什等台吉率领的1000名杜尔伯特兵、齐木库尔台吉率领的500名辉特兵,在质量上想必也是这些留在游牧地的老少人员组成。准噶尔能够南征北战,不惧两线作战,不在于其军队人数,而在于作战力量的有效利用,兵实不多。正因如此,探听到准噶尔内部实情的哈萨克左翼或中玉兹的领主,才敢分兵两路,从两个方向进兵袭扰。这也表明,哈萨克左翼的控制中心已推进至巴卡纳斯河流域驻扎。而哈萨克大玉兹的领主,也已推进至吹河、塔拉斯河流域驻扎。这都是准噶尔与清军作战期间完成的。

四、1732年准噶尔与哈萨克之间的攻防

1731年(雍正九年),受到哈萨克军队的两次侵袭后,准噶尔军队于1732年(雍正十年)便开始有针对性地向哈萨克展开了报复行动。同时,哈萨克方面也有一些军事突袭。作为背景,在这一年的夏秋季节,准噶尔近20000名大军,在小策凌敦多布将军的率领下,跨越阿尔泰山,对驻屯在扎布坎河流域的清军和喀尔喀蒙古军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并在额尔德尼召战役中战败而归,损失了一些精锐。趁此形势,哈萨克方面推进了袭扰准噶尔的行动。

1732年(雍正十年)准噶尔曾派15000兵进攻哈萨克,其中,辉特台吉巴勒珠尔由阿布赖克依特、乌林噶克察毛都路前往,卫征和硕齐由扎木乌古勒珠尔路进兵,诺颜和硕齐则从西里路行军,每路带5000兵。准噶尔进兵哈萨克后,同年9—10月间,哈萨克500兵为躲避准噶尔军队,经由索索克地方前来,掳走了杜尔伯特台吉巴罕曼济所属的200户。同时,哈萨克近200兵沿着额尔齐斯下溯,掳走了卫征和硕齐所属的130户。而由巴勒珠尔带领、经乌林噶克察毛都路行进的军队没遇见哈萨克,毫无收获而返。由卫征和硕齐带领、经扎木乌古勒珠尔路前行的准噶尔军队到达哈萨克之喀喇布隆地方,迫使哈萨克游牧迁移,只获少许哈萨克留下的牛羊。准噶尔军队差遣3000兵分3队进行掳掠。哈萨克兵截断其中的一支军队,交战时准噶尔兵阵亡100名,并从那里撤回。由诺颜和硕齐带领、经西里路前进的准噶尔军队沿着西里下去,到达哈萨克之和博克地方,亦分遣至各处掳掠,收获许多哈萨克俘虏。对此,哈萨克之喀喇哈勒巴克的军队,截断准噶尔的掳掠纵队,打死2000人。而没遇见喀喇哈勒巴克军队的人,仍将所获的少数战俘带回。^①

1732年(雍正十年)9—10月间,哈萨克兵突然到来,一并掳走了准噶尔1000余户人口及牲畜。噶尔丹策零听到此消息后,曾派台吉色布腾带兵前往,但正值寒冬时节,雪大,马畜又瘦弱而令中止。^②

1732年(雍正十年)冬,哈萨克兵突至,一并掳走了驻扎在准噶尔西部地区近1000户人畜。其后噶尔丹策零交给杜尔伯特台吉和硕齐、敦多克策凌、台吉巴罕曼济近10000兵,驻扎在边境阻截哈萨克来路。^③还说哈萨克不时前来抢掠,1732年(雍正十年)9—10月间,哈萨克来兵掳走辉特150余户,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4-113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出征准噶尔时被俘回子阿布都拉哈满等脱回并审讯送回原籍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4-161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暂将投诚之准噶尔人默尔根审明留营乘便解京折,雍正十一年八月初七日。

又从辉特一喇嘛处抢走1500匹马。^①

此外,1732年(雍正十年)9—10月间,哈萨克来兵掳走了杜尔伯特达赖太师属下200户。再从大策凌敦多布、鄂毕特鄂托克亚旺宰桑属下,掳走180户。^②1732年(雍正十年)秋收割庄稼时,哈萨克600—700兵,突然从额敏后面的察罕哈玛尔岭进来,将准噶尔驻扎在此处的辉特部3个德沁的人口全部掳掠。其后,由博罗哈玛尔岭出去,准噶尔追兵未赶上。同时,哈萨克阿布尔海尔汗子噶亚布苏勒丹带领其游牧,已推进至吹河那边的霍尔果图地方驻下。^③1732年(雍正十年),准噶尔卫征和硕齐带领4000兵,前去掳掠哈萨克,没什么成就,只获得30多人及少数牛羊食物,没有遇见哈萨克兵交战^④。

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年准噶尔进兵哈萨克的军事行动。上述史料中的辉特台吉巴勒珠尔,是辉特部卓哩克图和硕齐独子第巴的第五子,即其末子。他是该家族中拥有军事领导权的一位显赫人物。这一家族的属民包括居住在阿尔泰山中的一些乌梁海人。而卫征和硕齐,指前述辉特部齐木库尔台吉的父亲,即阿睦尔萨纳的父亲,也有可能是持有这一封号的其兄弟中的某一位。他的游牧地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其属民中也有居住在阿尔泰山北部的乌梁海人。诺颜和硕齐,应是辉特部鄂罗里克和硕齐家族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台吉,有可能是色布腾达什。他的游牧地应在赛尔山,即塔尔巴哈台山东段北麓一带。诺颜和硕齐本人经常带领军队防御和进攻哈萨克。1732年(雍正十年)这支准噶尔主动进攻哈萨克的部队,主要由辉特部的台吉和士兵组成。虽然传言有15000名,但从当时准噶尔军队的主力精锐在阿尔泰山东部与清军作战的现实考虑,不可能组织这么多人数的军队进攻哈萨克。依笔者之见,可能只有3000人,分3路进兵,每路1000兵,^⑤袭掳掠哈萨克东部后即撤回,以此向哈萨克表明准噶尔的报复。

关于此次进军路线,阿布赖克依特,即著名的阿巴赖庙,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的卡尔巴山南麓,恰尔河发源地一带。说明巴勒珠尔带领的准噶尔军队从阿尔泰山出发,向西越过卡尔巴山,沿着恰尔河下溯搜寻哈萨克。扎木乌古勒珠尔路,应指今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表明卫征和硕齐所率的准噶尔军队,沿着额尔齐斯河下溯,再从斋桑湖西岸、塔尔巴哈台山脉北麓间的谷地行进,向西北方向搜寻哈萨克。而西里路,则指西里—赛尔—萨里山,它属于塔尔巴哈台山的东段,位于今中国新疆和布克赛尔县一带。表明诺颜和硕齐率领的准噶尔军队从赛尔山出发,沿着塔尔巴哈台山北麓前进,向西搜寻哈萨克。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5~359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出征准噶尔时被俘披甲马尔泰脱回并审明送原旗安置折,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8~423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闻将抓获之准噶尔厄鲁特人罗卜藏等审明解往京师事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3~437页,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奏报来投厄鲁特纳木鲁及回子克什克口供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156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将投来之厄鲁特特古思济尔噶尔审明解京折,雍正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7~288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密奏投诚厄鲁特哈尔查海口供并将拿获之特古斯等一并解京备审折(附供单1件),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条载:“达尔玛达赖、卫征和硕齐、色布腾达什,是每人管辖一千户的台吉。巴勒珠尔,是管辖五百户的台吉”。他们共计只有3500户。

此次准噶尔军队的进攻路线和行动范围,位于东至阿尔泰山,西到阿勒辉山,南自塔尔巴哈台山,北至恰尔河下游为止的地区。当时居住在这一带的哈萨克人并不多,越往东人烟越稀少。这从“由巴勒珠尔带领,经乌林噶克察毛都路行进的军队,没遇见哈萨克,毫无收获而返”^①。这样的记载即可得知。而越往西人口越多,军队实力也越强,故而诺颜和硕齐经西里路前进的军队,虽然虏获不少人畜,然被哈萨克之喀喇哈勒巴克的军队尾追,损失一半而返。

接下来,再看这一年哈萨克进兵准噶尔北部地区的情况。杜尔伯特台吉巴罕曼济,是前述扎勒台吉的长子,同属于鄂木布代青和硕齐家族。虽然我们现不知索索克路在何处,但从杜尔伯特这一家族的领地来看,应该在塔尔巴哈台山西端南麓,阿亚古兹河东岸谷地靠北一带。可知,1732年(雍正十年)9—10月间进犯的哈萨克500兵,是从诺颜和硕齐军队进兵路线的南部,即从阿亚古兹河和塔尔巴哈台山之间的谷地,直接向南穿插突袭杜尔伯特部北部地区的。虽然掳掠的人口不多,但证明了哈萨克军队敢于斗争的一面。而另一路哈萨克200兵,则更加勇敢,趁准噶尔防守空虚,巧妙地顺着额尔齐斯河上溯,掳掠了卫征和硕齐的属民和喇嘛的马匹。

另外,察罕哈玛尔岭,在十八世纪称“哈玛尔达巴罕”^②,是塔尔巴哈台山脉中段的一个山口,位于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交界处,在中国新疆塔城市北52公里处,海拔2336米,今称“哈巴尔阿苏山口”。而博罗哈玛尔岭,十八世纪称“库屯达巴罕”^③,在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布拉戈达尔诺耶北部的塔尔巴哈台中。

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额敏河流域以南地带,即今中国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裕民县、托里县范围内的土地,是准噶尔著名将领大策凌敦多布台吉的游牧地,他还兼管北部的杜尔伯特、辉特等部,以防止他们叛变逃走。另外,噶尔丹策零直属的鄂毕特鄂托克、库热鄂托克及三吉萨的游牧,也都在额敏河一带。^④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向北防止哈萨克南侵,二是向东阻击清军由阿尔泰路进军伊犁。1732年(雍正十年)秋季,哈萨克600—700兵,从东边的察罕哈玛尔岭秘密南下,突袭大策凌敦多布管辖的鄂毕特鄂托克和辉特部3个德沁民众后,顺时针迂回,成功从西边的博罗哈玛尔岭逃出,甩开了准噶尔兵的追击。虽说哈萨克军的行动具有一定的冒险性,但这种军事冒险是在明确探知准噶尔军队主力在阿尔泰山东边与清军作战,剩下的部队由辉特台吉率领掳掠哈萨克,准噶尔北部鄂托内实无兵防守的前提下大胆进行的。

此外,1732年(雍正十年)9—10月间,哈萨克兵突袭准噶尔的西部地区,掳走了近1000名人口和牲畜。噶尔丹策零虽派台吉色布腾带兵前往,但正值寒冬雪大,马畜瘦弱而令中止。其实,这时的准噶尔正处于兵败额尔德尼召、精锐损失、内外交困的极端困难时期,已无力追击哈萨克兵了。不然冬季也是展开军事行动的关键时期。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②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七排西三”部分。

③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七排西三”部分。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3~80页,大学士鄂尔泰奏辉特部台吉达尔玛达赖遣来之达克巴口供单,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五、1733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1733年(雍正十一年)是准噶尔出动主力部队,大举进攻哈萨克的一年。这一年因准噶尔与清军的战事告一段落,双方军队进入对峙阶段,皆在等待时机,所以趁此间隙,准噶尔集中兵力,积极推进针对哈萨克的惩罚性军事行动。

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反映,1733年(雍正十一年)4—5月间,噶尔丹策零令5000名辉特兵每人骑乘两匹马,预备食用到11—12月的行粮,由辉特台吉色布腾达什率领,前往哈萨克方面的阿勒辉路防御。^①

又据该史料记载,准噶尔每年进兵哈萨克时,都是从11—12月间出发,过完年后4—5月间撤回。^②所以,1733年(雍正十一年)11—12月间,噶尔丹策零出兵10000人,由小策凌敦多布子曼济率领,前往哈萨克。^③

该史料还记载道,1733年(雍正十一年),准噶尔已向哈萨克进兵,由大策凌敦多布带领派往。同年9—10月间,与清朝军队已无战事,故挑选30000兵进军哈萨克。^④因这几年杜尔伯特人被哈萨克掳掠者多,故此次派兵前往哈萨克时,杜尔伯特兵去的份额较多,^⑤杜尔伯特部即派3000兵,前往哈萨克。^⑥

同年11—12月间,卫征和硕齐子沙克都尔、达尔玛达赖子琿启,引兵10000,前往哈萨克。^⑦

1731年(雍正九年),准噶尔3000兵前往哈萨克,交战时阵亡300兵而回撤。1732年(雍正十年)7—8月间,3000兵前往哈萨克,到达阿勒辉乌拉地方,没能交战即返回。1733年(雍正十一年)末,再派3000兵前去哈萨克。^⑧

综合分析以上战争信息,其中的阿勒辉路、阿勒辉乌拉,指同一个地方,《清乾隆内府舆图》中标记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7页,靖边大将军锡保奏闻询问辉特部达克巴厄鲁特与哈萨克交战情形折,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3~80页,大学士鄂尔泰奏辉特部台吉达尔玛达赖遣来之达克巴口供单,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8~423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闻将抓获之准噶尔厄鲁特人罗卜藏等审明解往京师事折,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7~288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密奏投诚厄鲁特哈尔查海口供并将拿获之特古斯等一并解京备审折(附供单1件),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9~109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被拿获之厄鲁特西喇卜等供词折(附议复片1件),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⑥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2~141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安置出征准噶尔时被俘脱回之兵丁齐彻布等折,雍正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⑦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1~188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报拿获厄鲁特和通等人并解送京城折,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⑧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2~287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奏出征准噶尔被俘脱回护军存格供词并将伊留军营安置折,雍正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为“阿尔辉阿林”^①，阿勒辉山，“巴哈纳斯必拉和库克萨里必拉”^②皆发源于此，指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卡拉乌尔—巴扬卡尔—扎纳尔纳—阿克列特”一线的山脉。巴卡纳斯河即发源于这条山脉的南麓。表明这条山脉是当时哈萨克人游牧的一条重要界线。1732年(雍正十年)7—8月间，辉特部3000兵前往哈萨克，到达阿勒辉山没有与哈萨克发生交战的情况说明，哈萨克在此山脉以东游牧相当少，此地人迹罕至。

而此1733年(雍正十一年)4—5月间，噶尔丹策零先派5000辉特兵(其实只有近3000人)，前往阿勒辉山一带防御驻扎。是在静观清朝军队的动向，倘若清军于是年7—8月间翻越阿尔泰山大举出兵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则用此3000兵防御哈萨克，而集中其他所有兵力抵御清军。因清军当年没对准噶尔深入打击，所以过了最佳进兵时节后，噶尔丹策零马上召集准噶尔上层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遣大军于11—12月间进攻哈萨克。

1733年(雍正十一年)准噶尔进攻哈萨克的军队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小策凌敦多布长子曼济台吉率领的10000兵，他们自西部，即在伊犁河中下游的西喇孛勒集结兵力后，沿着卡拉塔尔河奔向巴尔喀什湖，经结冰的湖面到达北岸后，从南部进攻哈萨克。这一路可称为左翼。而另一路准噶尔军队大约7000人，在大策凌敦多布、卫征和硕齐^③、沙克都尔、琿启等将领的率领下，沿着塔尔巴哈台山南麓向西北行进至阿勒辉山后，与色布腾达什率领的3000名准噶尔驻防兵会合，以10000人的兵力，自东向西进攻哈萨克。这一路可称为右翼。此次进攻的左右两路准噶尔军队，除了掳掠报复外，还可将哈萨克游牧地驱赶至远处，以防止他们再度进犯准噶尔。

另外，从这次领导军队的将领来看，除了大策凌敦多布和卫征和硕齐外，皆是年轻一代的将领。起初噶尔丹策零曾下令指派大策凌敦多布子达什策凌上前线担任将领，但大策凌敦多布认为自己三个儿子皆已战死，只剩下唯一的这么一个儿子，为了保护他，自己去了前线。可知，至此准噶尔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达什策凌、曼济、沙克都尔、琿启、色布腾达什、巴勒珠尔、齐木库尔等新一代青壮年将领带兵指挥准噶尔军队的时代。

六、1735年、1736年、1738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上述1733年(雍正十一年)的准噶尔报复性军事进攻后，哈萨克没有明显的进犯迹象，从相关满文档案中找不到有意义的线索。一方面，准噶尔和清朝之间，正在摸索媾和问题，1734年(雍正十二年)后双方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有规模的军事行动，只在所设卡伦互相观望哨探。其后1739年(乾隆四年)准噶尔与清朝正式商定和平，结束了双方近10年的军事敌对状态。另外，自1735年(雍正十三年)

①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六排西三”和“七排西三”部分。

②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清乾十三排图》，外文出版社，2007年，参见《清乾隆内府舆图》之“七排西三”部分。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7~288页，定边大将军福彭密奏投诚厄鲁特哈尔查海口供并将拿获之特古斯等一并解京备审折(附供单1件)，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条载：辉特四台吉下人，共有三千余人，俱是鸟枪兵，为使得力，这几年驻防哈萨克方面。今年进兵哈萨克时，又派去卫征和硕齐，与大策凌敦多布一同领导。

起,哈萨克又来准噶尔进行掳掠,所以从1736年(乾隆元年)始,准噶尔军队对哈萨克开始了新一轮的军事进攻。其目的,一在于报复,二在于掳掠人口以弥补自己过去战争中的损失。

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记载,1735年(雍正十三年)2—3月间,台吉琿启带领30 000兵,前去征讨哈萨克。^①1735年(雍正十三年)入秋后,哈萨克来兵,将准噶尔设在阿勒辉地方的卡伦40人,杀死其中30人,剩余10人步行逃出,紧接着又进来抢走300余匹马。^②

大策凌敦多布于1734年(雍正十二年)去世,他没让末子达什策凌继承遗产,而是令其孙达克巴继承。^③

1735年(雍正十三年)11—12月间,哈萨克100余人进犯额敏地方,掳走了额尔克台吉所属驻在斋尔河的100余口人。于是,额尔克台吉之子巴图孟克带领1000兵,前去征讨哈萨克,从哈萨克赶来10 000余匹马。^④

以上史料中的台吉琿启,是指辉特部首领达尔玛达赖子琿启台吉,他是噶尔丹策零的女婿,故在准噶尔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说琿启台吉带领30 000兵前去进攻哈萨克,这有点说不过去。一个是他还年轻,没有经验指挥这么多军队,二是他虽然是噶尔丹策零的女婿,但毕竟只是辉特部的一个台吉,而非准噶尔统治家族的成员,没有资格统率这么多军队。依笔者之见,琿启台吉这次可能带领3000辉特兵,前往阿勒辉驻扎,以防御哈萨克的进犯。所以到了秋天之后,哈萨克派兵突袭准噶尔设置在阿勒辉一带的卡伦,并抢掠了准噶尔的马匹。

另外,上述史料中的额尔克台吉,指辉特部的额尔克台吉,他是卫征和硕齐的父亲阿勒达尔和硕齐的族弟,也就是卫征和硕齐的叔叔。他的属民驻扎在塔尔巴哈台山南麓、斋尔河上游一带,即今哈萨克斯坦之东哈萨克斯坦州境内的乌尔贾尔一带。表明1735年(雍正十三年)11—12月间,哈萨克兵已到达这一带活动,并进行掳掠。如上所述,这一年在阿勒辉山一带驻扎有准噶尔3000兵,而在斋尔河西北部驻扎有准噶尔所属杜尔伯特部的军队。所以,哈萨克兵可能是从北部远处迂回到塔尔巴哈台山阴面,然后再翻山越岭到达南麓的斋尔河流域的。但是,额尔克台吉的独生子巴图孟克,带领军队进行报复,从哈萨克带回10 000余匹马,这可能得到驻扎于阿勒辉地方的准噶尔兵的协助,二者共同进兵哈萨克后取得的战绩。因为这些准噶尔之阿勒辉驻防兵也被哈萨克掳掠过马匹。

以下是相关满文档案记载的有关1736—1739年(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年)的战争记录。

1736年(乾隆元年)3—4月间,准噶尔发兵30 000,编为3路。阿勒辉路,由卫征宰桑率领10 000兵启程。伊犁路,由小策凌敦多布带领10 000兵前往。而不知另一路由谁率领。此30 000兵,俱前去攻打哈萨克。^⑤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23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由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孟克口供及派员解京事折,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23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由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孟克口供及派员解京事折,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2—23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由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孟克口供及派员解京事折,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26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报由准噶尔来投厄鲁特车林等供词并解京安置事折,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4—204页,定边大将军庆复奏报自准噶尔投来之厄鲁特塔尔巴口供并安置在察哈尔旗折,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大策凌敦多布子达什策凌,曾亲自领兵前去征讨哈萨克,带多少兵前往,不知其数。^①

1738年(乾隆三年)11月2日,从哈萨克地方,以巴尔鲁克苏勒丹为首,前来1000兵,掳走准噶尔台吉坎都扎布属下的500余户人。^②

从哈萨克地方,1738年(乾隆三年)来兵3次掳掠准噶尔,故于1739年(乾隆四年)6—7月间,派出噶尔丹策零族弟色布腾、大策凌敦多布孙达克巴等台吉,带领30000兵,前去征讨哈萨克。^③

1738年(乾隆三年)从哈萨克地方来兵3000,掳走准噶尔之塔尔巴哈沁1000余户。因此1739年,从准噶尔地方,以台吉西喇斯、曼济、卫征和硕齐扎勒布为首,经由3路,派去30000兵。^④

上述史料中的卫征宰桑,应指辉特部卫征和硕齐家族及其他家系的台吉,如沙克都尔、齐木库尔、琿启、巴勒珠尔、巴图孟克等。表明从阿勒辉路进兵的,仍是辉特部台吉率领的准噶尔军队,兵数应在3000左右,绝无10000人。而从伊犁路,即从伊犁河中下游的西喇攀勒集结出发的准噶尔军队是中路主力,由小策凌敦多布率领,可能接近10000兵。因时间在3—4月间,故冰雪融化,草木发芽,不能直接渡过巴尔喀什湖,只能绕道行军。是向左绕道至吹河流域,还是向右绕道至巴卡纳斯河流域,现已不清楚。另外一条路的进攻部队即左翼部队,应由大策凌敦多布的第四子达什策凌率领。依笔者之见,这一路准噶尔军队,是从吹河路进去的,规模不会太多,3000人左右,主要是掩护中路的侧翼。

此次出兵后,又休养生息了两年。因1738年(乾隆三年)哈萨克出兵3次,每次1000人,掳掠了准噶尔1000余口民众,故从1739年(乾隆四年)始,准噶尔又大举进犯哈萨克。

上述史料中的噶尔丹策零族弟色布腾,是噶尔丹策零的祖父僧格洪台吉的九弟彭楚克达什的长子博第木尔的次子。他是一位富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官,是继大策凌敦多布、小策凌敦多布之后,最具将师风范的人物。大策凌敦多布孙达克巴,是大策凌敦多布的长子纳木扎勒达什的长子,他是大策凌敦多布家产及政治地位的继承人,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年轻将帅。台吉西喇斯,现不知其具体系谱,应是准噶尔家族的一员,不然不会有军事将领资格。曼济则是小策凌敦多布的长子,也是具有很高军事才能的人物。卫征和硕齐扎勒布,是辉特部卫征和硕齐,他实际年事已高,只挂个名头,具体的行动由其子侄负担。

从这一时期的军事统帅序列来看,1739年(乾隆四年),准噶尔进军哈萨克时的3路,应该是左翼吹河路由台吉色布腾独自率领,中路伊犁路由西喇斯、曼济两位台吉率领,右翼塔尔巴哈台路或称额尔齐斯路由达克巴台吉和卫征和硕齐两人率领。因达克巴尚年轻,故由其祖父的亲密战友卫征和硕齐相伴,在辉特众多年轻台吉们的协助下,完成这次军事任务。军队人数最多只有20000,绝无30000。

在1736年(乾隆元年)、1739年(乾隆四年)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中,准噶尔的年轻将领得到成长,大兵团、大范围的军事行动,往往能够锻炼军事将领们的实战能力。其前哨侦查、正面进攻、翼侧攻击、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1-228页,镇安将军常赉奏报由准噶尔来投之厄鲁特丹津等口供及乘便解京事折,乾隆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3-137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将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喇嘛解送京城折,乾隆四年六月十八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3-137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将自准噶尔来投厄鲁特喇嘛解送京城折,乾隆四年六月十八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3-178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将自准噶尔脱回之镶黄满洲旗护军厄尔德木图等解送京城折,乾隆四年十月初六日。

远距离迂回、包抄、阻截、穿插、分割等战略战术,在实战中也会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提升。

七、1740—1741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

实际上,在1736年(乾隆元年)、1739年(乾隆四年)的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哈萨克受到准噶尔很大破坏,被迫向西迁移,造成很大的被动。但即便如此,噶尔丹策零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哈萨克问题,而于1740年(乾隆五年)、1741年(乾隆六年)连续两年派遣大军,集中兵力深入、彻底打击哈萨克。

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反映,1740年(乾隆五年)8—9月间,准噶尔出兵30 000。伊犁路以小策凌敦多布为首。吹河路,以台吉色布腾为首。额尔齐斯路以噶尔丹策零子台吉拉玛达尔济等人为首,驻防哈萨克。听说由台吉色布腾带领驻扎的10 000兵内,500卡伦兵,已被哈萨克打死,而其他军队,至今为止,仍预备驻扎在各自地方。^①

1740年(乾隆五年)3—4月间,准噶尔西喇斯台吉带1000兵前去攻打哈萨克,交战时败阵,西喇斯本人被哈萨克俘获。因台吉西喇斯带去的军队战败,噶尔丹策零甚是恼怒,于是当年9—10月间,出兵30 000,以台吉色布腾及小策凌敦多布子曼济为首,派去征讨哈萨克。^②

1740年(乾隆五年)哈萨克来战并掳掠,故于9—10月间,噶尔丹策零出兵30 000,以台吉曼济等人为首,派去征讨哈萨克。1741年(乾隆六年)4—5月间,抓来哈萨克首领阿布赖苏勒丹后,噶尔丹策零嘱咐台吉曼济等人:再调兵进征哈萨克,于6—7月前后,第二次撤兵回来。听说前去的军队,两次打败哈萨克后撤兵。^③

因先前哈萨克来战掳掠,故于1740年(乾隆五年)9—10月间,噶尔丹策零出兵30 000,以小策凌敦多布、噶尔丹策零子拉玛达尔济、曼济三人为首,派去征讨哈萨克。1741年(乾隆六年)2—3月间,捕获哈萨克首领阿布赖苏勒丹送来后,噶尔丹策零下令再次调兵进攻。^④

1740年(乾隆五年)噶尔丹策零曾向哈萨克派兵30 000,并于1741年(乾隆六年)掳来哈萨克首领阿布赖苏勒丹及300余人,已撤回20 000兵。噶尔丹策零子,今年16岁,名叫拉玛达尔济,以他为首,曾将10 000兵驻防在准噶尔西部。^⑤

应将以上军事行动看作统一的、连续的军事作战。综合分析上述史料可知,首先于1740年(乾隆五年)3—4月间,准噶尔西喇斯台吉带领少数1000兵前去攻打哈萨克,交战时败阵,西喇斯本人被俘。这其实是西喇斯台吉本人冒进、孤军深入的恶果,本可以此为鉴,教育年轻将领谨慎行事才对。但噶尔丹策零认为,准噶尔上层人物不应被哈萨克人俘虏,这是一种名誉上的巨大耻辱,故为了报复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6-36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闻由准噶尔来投厄鲁特罗卜藏口供并解送京师折,乾隆六年三月初八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3-387页,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将由准噶尔脱回喇嘛勒克西特送交策凌安插折,乾隆六年四月初六日。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8-401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厄鲁特乌巴什来归审明解京折,乾隆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④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1-405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厄鲁特孟克等自准噶尔来归询问原由解京折,乾隆六年七月十一日。

⑤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0-433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闻由准噶尔投诚之厄鲁特阿古萨拉等供词并解送京师折,乾隆六年九月二十日。

和一劳永逸地迫使哈萨克臣服,于1740年(乾隆五年)9—10月间,也就是最佳进兵时期,派遣20 000大军,分三路进兵哈萨克。这次仍然是左翼吹河路,由台吉色布腾为首。中路伊犁路,由小策凌敦多布子台吉曼济为首。右翼塔尔巴哈台路或额尔齐斯路,由噶尔丹策零16岁的长子拉玛达尔济为首。但是,右翼额尔齐斯路前进的军队,应是在阿勒辉山一带防御哈萨克东进,而非正式的打击部队。左翼由吹河路前进的部队,因人数太少而被哈萨克军队打死500人。这说明只有从中路进去的台吉曼济的部队才是主要打击力量。从其俘虏哈萨克之阿布赖苏勒丹的情况来看,这一路部队从结冰的巴尔喀什湖上快速行进,向北直插哈萨克的统治中心,以最快速度突袭哈萨克阿布赖苏勒丹集团。台吉曼济的作战风格,与其父小策凌敦多布如出一辙,很具有传承性,即集中兵力果断大举突击,不给对方准备机会,迅速包围,立即歼灭。曼济俘获阿布赖苏勒丹后,并于1741年(乾隆六年)2—3月间将其送至伊犁后,噶尔丹策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兵戈,而是继续增派部队,扩大打击面,试图以此完全压制并解决哈萨克问题。于是,1741年(乾隆六年)4—5月间,准噶尔第二梯队的进攻部队自伊犁路集结出发,继续深入和扩展打击范围。在此第二梯队中,就有以噶尔丹策零长子拉玛达尔济为首的部队。噶尔丹策零通过哈萨克战争,帮助其长子拉玛达尔济建功立业,积累政治资本,以便将来能够堂堂正正地担任准噶尔的统治者。此第二梯队的攻击部队,于1741年(乾隆六年)6—7月间撤回准噶尔本土,完成了历史性的使命。

关于其后的阿布赖苏勒丹的情况,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记载,1745年(乾隆十年),听说已遣回掳来的哈萨克阿布赖苏勒丹,而将其子作为人质,送至噶尔丹策零身边驻留。^①1743年(乾隆八年)哈萨克首领阿布赖苏勒丹带领其下1000户回子,归顺了噶尔丹策零。1745年(乾隆十年),阿布赖苏勒丹带领300人,跟随色布腾等人,去征讨阿布达克科勒姆等。^②

据日本学者小沼孝博教授的指点,此处的阿布达克科勒姆(Man: abdak kerem),是当时浩罕国第三代首领阿布德·卡里姆汗(Abd al-Karim khan, 1739—1746年在位)。阿布赖苏勒丹于1745年(乾隆十年)返回哈萨克本土,并将其子送至噶尔丹策零处当人质。其后哈萨克作为准噶尔的辅助军事力量,跟随准噶尔军队南征北战,进攻浩罕国,成为准噶尔重要的军事同盟。

八、结 语

综上所述,在1727—1745年(雍正五年至乾隆十年),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曾受到准噶尔部内外形势的直接影响。

在1729—1733年(雍正七年至雍正十一年)间,准噶尔军队正倾其全力在阿尔泰山东边与清军作战,不能有效防守游牧地,趁此形势哈萨克军队三番五次前来掳掠,西部和北部首当其冲,遭遇部分损失。其中,西部的额尔克腾鄂托克和北部的杜尔伯特、辉特两部的民众所受压力最大。虽然以辉特部为主的兵力,作为一个方面军,曾在哈萨克东部进行过一些进攻性活动,但因兵力薄弱,始终没能从根

①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5~99页,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奏解送投诚厄鲁特伍巴什等人进京折,乾隆十年七月初八日。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0~125页,军机大臣讷亲奏将投诚厄鲁特人博尔第等送往江宁安置折,乾隆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基本上战胜哈萨克军队。其最大的功绩在于,准噶尔军队已挺进至阿勒辉山一带防御。这从战略上,为后来的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准噶尔与清朝的战事结束后,从1735年(雍正十三年)始,准噶尔集中所有兵力于1736年(乾隆元年)、1739年~1741年(乾隆四年至乾隆六年)连续四年大举进攻哈萨克,纵深打击统治中心,俘虏其首领阿布赖苏勒丹,双方签订和平协议,终止了敌对行为。

除以上这些政治因素外,从纯粹的军事学角度观察,哈萨克兵力分散,集中缓慢,是其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所在。同时,在统一集中的军队中,缺乏高效的指挥系统和驿站传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人口稀少、后备力量不足、后勤补给跟不上,不能连续作战,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在准噶尔南边,有人口稠密的回部。在准噶尔东边,也有人口众多的清朝蒙古地区。这些都为准噶尔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优秀的兵源和经济基础,通过掳掠,使准噶尔能够持续开展军事行动。而在哈萨克的北边、西边、东北边,都是俄罗斯领土,南边是准噶尔,很难大规模掳掠人口,增加收入。

另外,准噶尔的地形,重峦叠嶂,戈壁纵横,有利于展开军事防御。而哈萨克的广大地区都是丘陵,有利于骑马军团展开军事进攻,不利于防御,只能通过远距离迁移来拉长防御纵深,以避免对方军队的锋芒。

最后,在战略战术方面,准噶尔的大策凌敦多布、小策凌敦多布、台吉色布腾、台吉曼济等,都是久经沙场的将领,曾长途跋涉进军西藏,奔袭额尔德尼召,在野战中怎样进攻、袭扰、防御、迂回以及有效使用火器等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

[责任编辑:邢文娟]

Summary Remarks and Contents

The Integration of Folk Culture from in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mmonality Amur(003)

Mr. Fei Xiaotong's research on ethnic corridors and the theory of "the Pattern of Multi-cultures and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both emphasize the regional view of the nationalities. The Mongol tribes in Hulunbuir mainly refer to the Bargas, Buryats and Ölöts, each of which have created ric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s in the region, with clothing being an important carrier. In history, due to the different migration routes of the three tribe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tc., their clothing has shown different styles and preferences, especially their typical clothing. However, in the Hulunbuir region, where the three tribes coexisted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they absorbed each other's excellent culture and exhibited regional commonality in their clothing.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were the common customs, religious beliefs and aesthetics of the three tribes. The commonality of clothing of the Hulunbuir Mongol tribes reflects not only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 but also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tribes.

Wars between the Jungar and Kazakh in the Reign of Galdan-Tsering (1727-1745)

..... **QI Guang(014)**

Utilizing the Scribed Manchu Archives of the Qing Grand Secretariat housed i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this study aim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spectrum of military activities that unfolded during the reign of Galdan Tsering from 1727 to 1745. These military endeavors encompassed a wide range of operations, including military defense, border conflicts, battles and combat, involving the Jungar and the Kazakh. Our research place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roviding a detailed exposition of each of these events, comprising their chronological sequence, geographical settings, commanding officers, troop sizes, principal objectives, contextual backgrounds, and the geographic topography of the battlefields.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apter of Khoshot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Qinghai, II

..... **Lubenzhashi(030)**

The New Rhyme of Sanskrit, which i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Qinghai, is an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Khoshot Mongols written in Tibetan, in 1786, by the famous Mongolian monk Yisibaljur (1704-1788) 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 of the great grandson of Gushi Khan, Erdeni Chechen Boshogt Beise Choijidorj. The term Qinghai here is not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Qinghai Province, but the entire territory put under the rule of Khoshot Mongols including Qinghai Province today, Gansu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Aba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some parts of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chapter in question includes the history of Qinghai Lake, the rulers of Qinghai throughout histor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 author was a religious figure, he dared to criticize fallacies and had his own unique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ical event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book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ibetan-inhabited areas of Qinghai, Xizang, Gansu and Sichuan as well as for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